

李篤安總主教——中國天主教聖統制的典範

柯毅霖著 陳愛潔譯

李篤安總主教以他的生命、思想和抉擇，給中國教會指引了光明的道路：天主教會是至一的，與

教宗和普世教會合一；教會沒有政治議程，但準備與俗世公共權力合作；然而，教會也維護本身的自由；教會的存在是爲了傳揚福音，是傳教性的；教會服務社會，尤其是最貧窮的人。藉著以上種種，李總主教活出了一位中國總主教的典範。

這些原則十分簡單而明確。但正是身處中國的困境中，仍堅定地承諾遵守這些原則，使李篤安的見證顯得如此罕見和珍貴。難怪當李篤安總主教於

二零零六年五月廿四日去世的時候，在中國和世界各地，無數的人表達出發自內心的哀悼。

這位現代中國的總主教以他的美德、熱誠、勇敢、堅強的信德和可作楷模的領導才能，給我們留下了光輝的遺產。他與教宗，並與主教團的兄弟們團結共融。中國的天主教徒，不管是屬公開或非公開的團體，不但非常尊重他，甚至敬仰他。

他安葬在西安教區臨潼縣的公義堂內。爲很多深愛這位道德高尚老牧者的教友來說，他的墳墓已成爲他們朝聖的地方。

在教會中促進共融和合一

在李總主教去世前幾個月，溫順天神父曾到醫院探望過他。溫神父憶述，李篤安總主教給每位到訪的人展示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聖體聖事主教會議（二零零五年）後贈送給他的權戒並說：「這是我與教宗共融的權戒。」李總主教明確肯定教宗在天主教會中的職務：

教宗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傳自宗徒這本質，乃建基於一個事實，就是它的管治是從宗徒們傳下來的，以伯多祿這首位領袖作為開始。教宗有權管治和監督教會的一切活動，包括選聖主教在內。我們從不否認教宗有這樣的權利，因為這是我們天主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教宗的管治權是真實的。

由於李篤安總主教努力在教會內建設合一與修和，所以同時獲得公開和非公開教會團體的尊

敬。兩個團體的人們爲了實現教宗的呼籲和李主教的榜樣，致力合一與修和，表現出一顆真正的公教心。

教會內部的分裂顯然削弱了天主教團體，並提高黨和政府官員持續及擴大其控制的機會。修和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工具，能夠擊敗這樣的宗教政策。所有的中國天主教徒都團結在同一信仰中。就我所知，教宗尊重雙方團體，號召大家和解、統一。一些地下團體說我們反對教宗。我是屬於「公開教會」的，但是，我並沒有背教，因為我堅決承認教宗的首席權。我們擁有相同的信仰，我們都與教宗保持一致。爲此，我們就應該在教會的傳統體制和教義中達至合一。

十八年的牢獄生涯卻沒有憤懣

李篤安，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陝西省西安地區。他於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晉鐸。他曾三

度被長期拘留。第一次沒有任何正式的判刑，卻自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起關押至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第二次被判監禁三年，由一九五八年四月至一九六零年四月；第三次也是最長的一次，被判監禁二十年，由一九六六年三月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儘管經歷多次不公義的長期監禁，他仍然心境平靜和樂觀，絲毫沒有怨恨那些令他受那麼多痛苦的人。

一九八零年至八七年間，李篤安在西安教區臨潼縣公義堂任堂區司鐸。一九八七年四月五日，他獲祝聖為西安教區主教，同時得到聖座和中國政府承認。他雖然爲了教會的益處而接受與國內的政權合作，卻沒有損害作爲人、信徒和主教的尊嚴。

西安總主教

請容許筆者這樣說，多虧李篤安總主教的神恩，他把西安改造成一個模範教區。在公開和地下兩個團體之間沒有內部分裂；教友度著虔誠的基督

徒生活；聖職人員既訓練有素又團結合一；聖召蓬勃。李總主教，作爲一位父親，歡迎那些在自己教區生活艱難的修生到他的教區，並爲貧困的教區提供司鐸。

按照一九四六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宣佈建立的中國天主教聖統制，西安是陝西省八個教區的總教區。西安也是中華帝國的古都之一，是基督宗教在華的搖籃。陝西省的天主教徒多達二十六萬，聖召蓬勃，有二百七十位神父和約六百位修女，人數位於全國前列；亦有最多的聖堂，達四百多座，當中包括重建和最近落成的。來自省內的許多修女、修生和神父前往全國各地的貧困教區服務。李總主教其中一項優先處理的事，就是興建一座有一百五十名修生的總修院；又設立了一座小修院，收錄了五十名年青人。他非常讚賞修女的神恩和服務，並在一九九七年在西安總修院開辦一項培訓修女的課程。

李篤安總主教積極把握發展的機遇。他是首位在二零零二年開設天主教社會服務中心的主教之

一。中心由陳瑞雪神父領導。在德國 Misereor 機構及其他國際機構的支持下，贊助陝西省各地貧困農村的小項目，例如：開掘水井和灌溉系統；提供健康和教育服務（如免唇手術，建學校）；照顧孤兒，以及援助受天災影響的家庭。李總主教聘請了全職職員，並廣納義工參與。

在陝西省，知識份子、大學生和專業人士的皈依人數不斷增加。當有人指出基督教徒發展得比天主教徒更快時，李總主教毫不感到失望，反而說這是好的跡象。

很多年輕人對基督信仰感興趣。甚至有些知識份子樂意接受基督宗教。基督教徒人數以較快的速度增加。他們比我們積極，他們與學生和知識份子有較緊密的接觸。他們喜歡聖經的信仰，因為這不要求他們付出太多。然而，我們必須為他們的成功感到高興。人們聆聽基督的聖言後，當他們想加深自己的信仰時，他們最終會欣賞天主教傳統和教義的寶藏。

一位受到脅迫仍面帶笑容的勇敢主教

李總主教是一位具有深厚靈修素養的人，因此他能夠以平靜的態度面對任何問題。作為公開教會的道德領袖，他與教宗共融，所以必須面對那些執行宗教政策的官員的威脅和操縱。

二零零零年一月六日，李總主教勇敢地拒絕出席在北京舉行的非法祝聖五位主教禮儀。翌年十月，他也表現出同樣的勇氣，拒絕參加政府反對冊封一百二十位中華殉道聖人的運動。結果他要接受多次冗長的盤問，他的自由受到嚴重限制，包括阻止外國導師在他的修院任教，也禁止他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前往羅馬出席特別主教會議。李篤安與其他三位中國主教原獲邀請出席該次會議。

作為一位明智的牧者，李總主教公開與政府當局一起工作，擔任中國天主教會主教團副主席，卻沒有放棄他對信仰基本內容和教會權利的意見。在評論二零零三年那旨在加強控制公開教會團體的

「三個文件」(二零零二年二月)時，李篤安總主教表明：

如果這些文件是根據天主教會傳統而制訂的，我們認為可以接受。但是，絕對需要維護耶穌親自建立的教會聖統制。宗徒們的繼承人主教的權利是真正的管理權。誠然，每一位主教都有他本身的局限性，但他們都應該像一個僕人那樣領導教會。主教的權利是名副其實的，是不能縮減成象徵性的標誌的。任何人都不能取代主教領導教會。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積極促進平信徒參與教會生活。主教應該開放自己，接納平信徒的貢獻。但是，主教始終是領袖，他的作用是不能被架空的！

即使他必須接受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存在，李總主教堅定不移地維護教會的自由，抵禦愛國會聲稱和企圖施加的控制：

在我們所處的情況下，我們注意到了中國天主

教愛國會的存在。如果它的作用是将教友們聚集在一起，那麼，是不應有問題的。愛國會不能凌駕於教會之上，應該在教會內，在主教的領導下。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住在西安主教座堂隔鄰的多名修女，因反對當局充公她們的學校而遭毆打。在中國和世界各地，有很多人抗議當局對這些無辜和手無寸鐵的修女採取此如野蠻的行動。當時李總主教正臥病醫院，他仍發揮他的領導才能，表現出克制和務實的態度：他買回學校和土地，好使修女們能夠在西安市中心、在主教座堂附近，繼續和發展她們寶貴的臨在。

新領導層的挑戰

中國天主教會正跨進歷史中的關鍵時刻：領導層的改變。年長的主教們，例如李篤安等，都先後去世，因此，領導的工作落在很年輕的主教身上，

其中有些仍未足四十歲。新的主教將要管治差不多四十年，因此，候選人的選拔顯然對於教會是極爲重要的。李總主教在生前，有時以巧妙的方式給西安及省內其他教區提供年輕和合適的主教。

近年的經驗清楚顯示，中國的教友不願意接受由一位非法主教所管治。事實上，非法祝聖的主教將成爲一個遭擯棄的主教、一個沒有羊群的牧人。令人感到十分喪氣的是，看到政府和愛國會的官員未能承認自己的政策不奏效，而且極端地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在（雲南省）昆明市祝聖馬英林，和五月三日在（安徽省）蕪湖市祝聖劉新紅爲主教。這情況看來是倒退六年至二零零零年主顯節，即李篤安總主教拒絕前往北京祝聖未經教宗批准的主教。李總主教深切體會到問題的複雜性，有點如履薄冰，但他在謹慎中不失智慧。

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是新主教的選舉。在目前局勢下，我們不能在未能得到政府批准的情況下祝聖新的主教。如果政府不反對我們提出的

候選人，我們就報請聖座批准。一旦教宗沒有批准，那麼，我們是不會祝聖這候選人的。

聖座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發表聲明後，更迫切敦促神父抵抗非法祝聖。候選人應該好像李總主教那樣堅強和襟懷坦蕩地抵抗不合理的壓力。候選人宣佈放棄主教職（有時只是暫時性），而不是放棄自己的良心，這更爲適當。

我們是信徒，我們的思想和行爲應如信徒一樣。身爲信徒，處於這微妙的時期，即領導層由年長一代轉移到年輕一代的時期，我們應該在牧民上和在精神上，不遺餘力地支持主教、神父、修女、修生和信友。筆者想以李總主教樂觀的語調來結束這篇紀念他的文章，「這未來十年內新祝聖的肯定都是年輕主教，我在十年內就會死了。我相信天主會幫助他們管理好教會。」

□